

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及新階段

◎ 姜義華

中國民族主義的特徵

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在中國雖然剛剛興起，卻已足以展示隨後數十年中國民族主義一些最主要的特徵。

從一開始，人們就將建立民族國家視為民族主義的中心內容。1902年6月《政藝通報》就刊出了題為〈民族主義〉的文章，1903年3月《新民叢報》所刊出的〈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以「民族之國家」為題，提出：「近日世界之大事變，推其中心，無不發於民族主義之動力」，並明確指出「故十九世紀，實為民族國家發生最盛之時代。其民族不同者，則獨立為一國，如意大利之獨立，希臘、羅馬尼亞之獨立是也。民族同一也，則結合為一國，如德意志聯邦、意大利之統一是也。民族之勢力，可不謂巨歟！」^①這期間，最具有代表性的論述，是《浙江潮》第一、二、五期連載的〈民族主義論〉一文。文章給民族主義下了一個定義：「合同種，異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是曰民族主義。」文章大聲疾呼：「今日者，民族主義發達之時代也，而中國當其衝。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在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中，族類民族主義、政治民族主義及文化保守主義特別發達，相形之下，建立在統一的國內市場基礎上的經濟上的民族主義則異常薄弱。

其後，民族主義被孫中山和中國同盟會確定為中國革命的首要目標，汪精衛在《民報》第一號上刊出的〈民族的國民〉解釋這一綱領時，所持觀點也是如此。民族主義之所以引起中國思想家、改革者們的重視，主要不是基於中華民族自身在向近代民族發展方面有了質的飛躍或重大突破，而是因為中國過於落後，面臨嚴重的被瓜分甚至被滅亡的危機，民族主義的倡導者們希望效法斯拉夫、德意志、意大利，利用這面旗幟，集中中華民族全體成員共同奮鬥，以掙脫列強對中國的欺凌與奴役，使中國臻於繁榮和強大。因此，在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中，族類民族主義、政治民族主義及文化保守主義特別發達，相形之下，建立在統一的國內市場基礎上的經濟上的民族主義則異常薄弱。

所謂族類民族主義，指的是離開社會經濟的發展，直接從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生物進化論來判定民族的特點與命運。這在二十世紀初特別盛行。《浙

江潮》所刊〈民族主義論〉便曾將生存競爭學說宣佈為民族主義之源：「自物競自存之說興，於是種類盛衰之故明。進化論者，實民族主義之原也。」是時，提倡民族主義最力的章太炎在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宣稱，今日固為民族主義之時代，種族之界必不可破。他雖然強調「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為界，不以天然民族為界」，但他所謂歷史民族，如他在《疇書·原人》中所說，「人之始，皆一尺之鱗也，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獷而戎夏殊」，是因開化時間遲早不同及文明程度有別而形成。〈原人〉要求「秩乎民獸，辨乎部族，……一切以種類為斷」，實際上仍然是族類民族主義。這種族類民族主義，和中國傳統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觀念最易契合，因而很有影響。其後，作為一種學說，這股思潮漸趨沉積，只在德國法西斯主義所鼓吹的種族主義特別盛行之時，一度在中國出現應和者，但其潛在的影響仍不可忽視。

所謂政治民族主義，指的是將民族主義歸結為建立民族國家，歸結為集中全力進行政治鬥爭，乃至軍事鬥爭。1902年8月18日《新民叢報》第十四期所刊雨塵子〈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注意到「中國不為外人政治上之領土，而為經濟上之領土，不支配於外國之政治家，而支配於商工業家」，注意到中國所處的乃是經濟競爭之世界，但論及中國自存之道時，便立即從經濟競爭轉向政治決定一切：「近世歐洲意大利之獨立，日耳曼之聯邦，皆以同一種族，建一國家，民族主義之勢力，大振於已往之政治界。吾國之不振，非歐族使之然，自族不能建國家之故也。歐人不於十九世紀中，大振民族國家之勢力，則二十世紀中經濟競爭，必不能強橫至此。於經濟競爭世界中爭自存者，皆宜如此也。」作者忽視了沒有市場經濟的必要發展，沒有近代資本主義經濟上足夠的力量，歐洲建立民族國家也就沒有可能。然而，這種認識卻極普遍。人們傾注全力於政治鬥爭，將經濟的發展看成是未來民族國家已經建立之後方應注意的事情。另一方面，文化民族主義者在倡導民族主義時，易於將民族文化等同於傳統文化，等同於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而忽視文化上的變革、創新，排斥對外來文化的吸取和再造。他們主觀上是要增強民族在精神上、文化上的凝聚力，但常常阻礙了對於傳統觀點的突破，妨礙着衝決與近代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及世界化相抵牾的舊的精神網羅，反轉來箝束了現代民族經濟的蓬勃發展。這常常是文化保守主義教吹者們所始料不及的。

形成中國民族主義的條件

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具有種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民族主義強大，而經濟民族主義薄弱的特徵，主要是由於救亡的急迫需要，而不是根植於民族經濟的發展和民族統一市場的形成。投身於民族主義運動的，有隨着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世界化的發端而產生的新型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但為數更為可觀的，則是仍然生活在原先自然經濟、小生產、鄉村化基礎上的廣大農民和其他社會成員。這兩種力量都努力挽救民族危亡，但取向並不一樣。前者要求在救亡中發展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世界化，並以此為推動救亡成

功的正確之途，後者則要求在救亡中保護他們原先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及與世隔絕狀態，並因此而排斥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在多次民族運動中，特別是在以戰爭這種最激烈的形式進行的民族運動中，正是廣大農民的投入，起了主力軍或決定性的作用。義和團運動如此，抗日戰爭尤其如此。在本世紀大部分時間中，這一格局基本未變。要了解民族主義主要特徵何以形成，這正是關鍵之所在。

孫中山於1924年1月至2月所作的「民族主義」演講是本世紀中國民族主義最重要的文獻之一。這一文獻十分集中地表現了民族主義在中國發展的特點，以及形成這些特點的原因。在談到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時，他所指望的，頭一種就是「要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即了解「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在這個生死關頭須要避禍求福，避死求生」，充分樹立救亡意識。第二種方法，是「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以此改變中國人一片散沙的狀況。第三種方法，就是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特別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與此相連帶，還要恢復固有的知識、固有的能力。在這裏，孫中山看到了中國一片散沙情況的嚴重，希望用民族主義來加以根治，但面對政治力、經濟力在其他民族發展中作用愈來愈大這一現實，他在中國所指望的，仍一是危機意識，二是固有的宗族關係，三是固有的道德、知識、能力，完全撇開了經濟力與政治力的決定性作用。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面對外部威脅而形成的尖銳的民族危機，成為呼喚民族主義的第一動力，形成統一的民族市場和強大的民族政治，這一發自民族內在的近代化需求的更為深層的動力，根本沒有提到。

在各種民族主義思潮中，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影響最鉅的，是來自共產國際的民族革命運動理論。1920年7至8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專門討論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列寧在報告中說明，他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思想，

在多次民族運動中，特別是在以戰爭這種最激烈的形式進行的民族運動中，正是廣大農民的投入，起了主力軍或決定性的作用。要了解民族主義主要特徵何以形成，這正是關鍵之所在。

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中國面臨亡國威脅，民族主義膨脹，變成了犧牲個人自由以確保國家安全。



就是確認帝國主義已將世界各民族分為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兩大類^②。他為大會草擬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初稿宣佈：「共產國際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主要應該是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彼此接近起來，共同進行革命鬥爭去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③1922年11至12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關於東方問題的總提綱強調：「一切民族革命運動共同的基本任務，就是實現民族統一和取得國家獨立，要想真正而徹底地解決這項任務，就要看這個民族運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廣大勞動群眾吸引到自己的行列中來。」總提綱在論及大多數東方國家革命運動時，特別指出，如果不依靠廣大農民群眾，這些革命運動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因此，必須宣佈堅決改變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以使農民群眾積極參與民族解放鬥爭。1923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專門論述了中國進行民族革命的問題，指出：「只有把中國人民的基本群眾，即佔有小塊土地的農民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④1926年2月至3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再一次指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主革命趨向能否取得勝利，取決於四億中國農民群眾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中國工人一道並在他們的領導下參加決定性的革命鬥爭。」^⑤斯大林的一段話，說得更加直截，「民族問題的基礎，它的內在實質仍然是農民問題，……農民是民族運動的主力軍，沒有農民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聲勢浩大的民族運動。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正是指這一點說的。」^⑥這些論點，在長達數十年的民族運動中，曾經處於支配地位。

中國的民族主義為何重於外而輕於內，為何重於政治文化及族類的存在，而偏偏輕於近代民族統一市場與民族經濟的發展，從共產國際的這些觀點中可以獲得更加明晰的答案。外部所面對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各國沉重的民族壓迫，內部所依靠的主要是仍然保持着原先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取向、行為方式的廣大農民，這正是問題關鍵之所在。正因為如此，民族主義、民族化常常演化為排外主義、保護落後的同義詞。

現代民族市場經濟不發達，使適應於小農普遍存在的行政權力對於社會的支配作用特別強固。行政權力的高度集中，以及這一權力對於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控制，利於將趨向各異的多種力量集合在一起，尤其利於將分散孤立的眾多小農集合在一起，將他們變成一支有組織的力量。政治權力的這種特殊發展和特殊作用，使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常常處於互相牴牾的狀態，即民族主義的膨脹，常常壓制了民主主義的正常發展。孫中山1924年所作的「民權主義」的演講，便針對中國人一片散沙這一現實，反覆說：自由，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到了國家能够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法，便要大家犧牲自由。」^⑦民族主義在這裏逕直變成了犧牲個人的自由以確保國家的完全自由。民族主義順沿這一方向朝前發展，憑藉政治權力的作用，正如孫中山所期望的，在一片散沙之中加入了土敏土，使這片散沙結成了一個堅固的大團體。但與此同時，政治上的過分集中和過度控制，卻又妨礙了各區域、各部門經濟

1923年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專門論述了中國進行民族革命的問題，指出：「只有把中國人民的基本群眾，即佔有小塊土地的農民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

自身的聯繫廣泛而普遍的發展，經濟、社會、文化都通過政治權力等級結構系統向上負責，相互之間缺乏自由的橫向的聯繫，統一的民族市場與民族經濟因此也就難以依靠經濟與社會本身的發展而形成。政治權力的高度控制可以使國家經濟和行政保持統一的格局，而外部壓力一旦減弱或中央權力一旦衰退，地方主義、軍閥割據、諸侯經濟、分裂主義便免不了會泛濫起來。所有這一切，會進一步增加形成民族統一市場、建成真正的民族國家的困難，中華民族形成真正的近代民族因之反而多了一層障礙。

新 階 段

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利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充分依靠國家行政權力的支配作用，積聚了人力、財力、物力，建立了較為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但是，行政權力對於經濟活動縱向的全面支配，以及對社會、文化等領域縱向的全面控制，非但無法防止資源配置、發展速度、流通與分配等等方面極為嚴重的主觀隨意性，而且也無法使各地區、各部門按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廣泛地建立相互之間的橫向聯繫，使全民族的團結與統一確立在藉助市場而形成的真正一體化的經濟基礎之上。文革結束以後，正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本身的需要，推動中國大陸終於走上改革開放之路，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逐步被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民族主義注意的中心從政治轉向經濟，救亡從排外、抗擊外來侵略與掠奪轉向充分利用世界文明的成果來充實自己，就是必然的了。

當前，在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時，還出現了建立大中華經濟圈的動議。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發揮各自的優勢，並藉助其他方面彌補自己的不足，形成優勢互補的整體力量，以增強各自以及整個中華民族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民族主義這一次新的高潮，是對先前民族主義的突破和發展。因此，在中國向世界進一步開放，以更大的規模走向世界時，民族主義仍然具有生命力。

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本身的需要，推動中國大陸終於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民族主義注意的中心從政治轉向經濟，救亡從排外、抗擊外來侵略與掠奪轉向充分利用世界文明的成果來充實自己，就是必然的了。

註釋

- ① 雨塵子：〈近世歐人之三大慶舉〉，《大新叢報》第六十八期。
- ②③④⑤⑥ 《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文版社，1982），頁19-20；頁50；頁78；頁139；頁102。
- ⑦ 《孫中山選集》，頁722-23。

姜義華 1939年生於江蘇，現為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革命史、中外關係史和史學理論研究。著有《章太炎思想研究》以及散見於學術刊物和文集的十數篇論文，並編有《康有為全集》、《章太炎全集》等書籍。目前在進行「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和「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兩課題的研究。